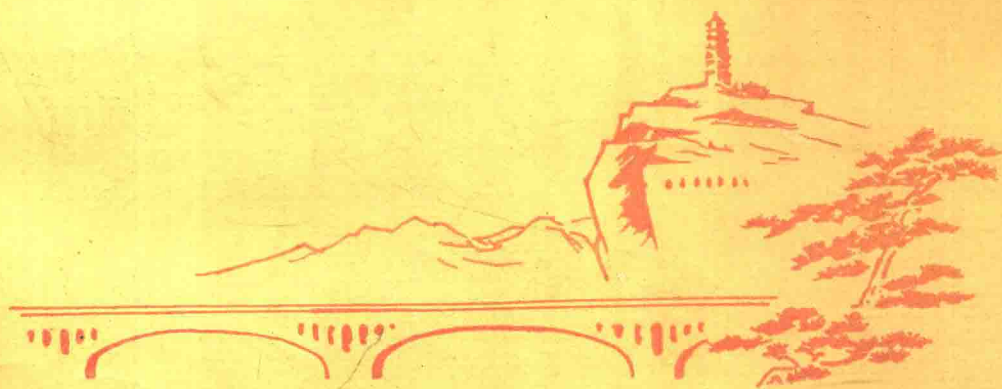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论丛(七)

现代文学论文集

中山大学 中文系 编
学报编辑部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现代文学论文集

—— 现代文学研究 ——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

庆 祝 建 国 三 十 五 周 年

庆 祝 建 校 六 十 周 年

IN CELEBRATION OF THE **35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CELEBRATION OF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目 录

论鲁迅的前期思想.....	陈则光 (1)
论鲁迅杂文的喜剧性艺术.....	邓国伟 (23)
论巴金小说的艺术风格.....	吴定宇 (43)
论徐志摩的诗歌.....	罗尉宣 (59)
论老舍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发展.....	王家声 (80)
小诗派初探.....	黄渭扬 (97)
郭沫若历史剧语言艺术初探.....	王剑丛 (105)
郁达夫小说琐议.....	高鹤佳 (113)
作家的个性与风格	
——略论《虾球传》的艺术成就.....	吴宏聪 (120)
拂去尘埃现明珠	
——原中国诗坛社成员访问记要.....	陈颂声 邓国伟 (126)
冯乃超年谱简编.....	李 江 (141)

论鲁迅的前期思想

陈则光

鲁迅在青少年时代所受的思想影响是多方面的。他故乡历史上的先进人物的反抗思想，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想和民族革命思想，外国浪漫派诗人的民主爱国思想，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为人生”的思想，中国的韩非、庄周的思想，嵇康、阮籍的反礼教思想，都曾给他一定的影响。但构成他前期思想的主要部分而起支配作用的则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和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思想，正如瞿秋白所说的：“鲁迅在五四前的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还是他的基本。”〔1〕

鲁迅思想前后期的划分，多数人主张以一九二七年为界线，即一九二七年以前为前期，以后则为后期，这是切合实际的。但是根据鲁迅思想发展的实际，前期有必要划分为“五四”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八九九年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开始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至“五四”运动前夕的一九一八年，这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时期鲁迅在日本经历了孙中山、章太炎所发动的对保皇党的一场大辩论，并受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的影响，而成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在理论方面，基本上是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作为依据的。对于有关历史的发展和如何改造社会，显然带有浓厚的唯心论色彩。

第二个阶段——一九一八年五四运动前夕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这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了。这时期鲁迅在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影响下，思想发生显著的变化，产生了无产阶级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新的思想因素。这种因素，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增长、扩大，终于取得主导地位；唯物史观也就跟着取代唯心史观而占优势。由于思想上的量变，从而促使他的思想发生部分质变，由革命的民主主义向无产阶级民主思想突进了。这一变化，大致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后日益明显。五卅运动以前，在鲁迅的作品里，进化论观点和资产阶级的个性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思想因素是交相出现的。后者即使是决定性因素，但表现在前期作品中的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比起他的后期作品来，其局限性就更明显了。因为这两种思想矛盾斗争的激化，曾使他一度感到“空虚”，“彷徨”。五卅运动以后又经历了“三·一八”惨案，鲁迅思想上向无产阶级宇宙观的转化更加快了。特别是到广州之后，进一步接触了马列主义，加深了对国共两党和当时国内革

命战争的认识，世界观已临近彻底转变的前夜。无产阶级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这时已经成为鲁迅思想的主导，无产阶级思想体系逐渐形成。这是鲁迅思想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极重要的阶段。

关于鲁迅思想的发展和世界观的转变，究竟由什么到什么，过去大都遵循瞿秋白的说法：即“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2〕。这说法还是比较全面的，不能说不。鲁迅的前期思想，进化论和个性主义占主导地位，后期无疑是阶级论者和集体主义者，但是问题在于这一说法并不足以说明鲁迅思想发展和世界观转变的根本特征。后来有些同志连“从个性主义到集体主义”也不提，只提“从进化论到阶级论”，那就更加片面了。世界观最重要的部分是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用“进化论到阶级论”来标志鲁迅思想的发展和世界观的转变，既没有明确表明鲁迅前后期不同的政治思想，也没有明确表明鲁迅前后期不同的哲学思想。进化论不能概括鲁迅前期思想的全貌，阶级论亦不能显示鲁迅后期思想的高度，因为后期鲁迅已经是卓越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和辩证唯物主义者，不仅仅是阶级论者。深入考察鲁迅前期思想的实际，我们可以肯定，从政治思想来说，鲁迅是从革命的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从哲学思想来说，他的自然观是唯物的，而历史观是从唯心到唯物的。无可否认，鲁迅前期的历史观也有唯物论的成份存在，不过就其主要倾向来看，则是唯心的。

列宁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所作的结论是：“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3〕。既着眼于哲学思想，也着眼于政治思想，完整地阐明了作为世界观的两个主要方面。固然，鲁迅比马克思迟生六十多年，二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所走的生活道路各不相同。但按思想发展的规律，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者大都有过象马克思那样的思想历程。所以列宁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结论，对于我们研究鲁迅思想的发展，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他在政治上，是沿着中国革命的道路，由革命的民主主义，然后到共产主义的。鲁迅又是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世界的认识，是随着近代世界革命思潮的发展，由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也就是由历史唯心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青年时代的鲁迅是坚决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的民主战士。

他前期的民主主义思想，在少年时代就开始萌动滋长了。他外婆家在农村，有机会接触劳苦农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和花鸟并不一样”〔4〕。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时，有机会下到矿井，又接触了工人，了解矿工们在积水半尺深的矿洞里面“鬼一般工作着”，“情况实在颇凄凉”〔5〕。因而鲁迅从小就同情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希望他们从封建压迫剥削中解放出来。同时鲁迅出生在祖国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年代，腐朽无能的清王朝累吃败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民族生存，朝不保夕。他在日本还亲身经历了弱国人民所受的歧视，受刺激很深。那时他大量阅读了西欧所谓“摩罗”诗人和东欧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迫切希望“风雨如磐”的祖国，振衰起敝，从帝国主义的蹂躏奴役下获得新生。他在一九〇三年发表的《中国地质略论》里写道：“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今则成了“孤儿”，“人得而挾楚鱼肉之”，而国人“昏昧无知”，面对“伸手如箕，垂涎成雨”的强邻，不知“左操刃右握算”，甚至“引盗

入室”，“是诚我汉族之大敌也”。充分表露了他的热爱祖国的激情。这便是形成鲁迅前期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源泉，也是推动鲁迅思想发展的基本动力。那时他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个性主义，是被他作为思想启蒙的指针而接受的。

二

清朝末年，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播到中国，那时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新派人物，为了抗御帝国主义，从西方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等理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方案。如资产阶级维新派梁启超、谭嗣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章太炎等，都曾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恩格斯认为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重大成就的三大发现之一。^{〔6〕}在中国首先传播这一学说的是严复。严复于一八九五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著名论文《原强》，着重介绍了达尔文的学说，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出后，“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其影响超过英国科学家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实为西人“经国利民之一大事”。同年严复又译述了达尔文的朋友赫胥黎宣传达尔文主义的著作《天演论》（即《进化论与论理学》），阐明了宇宙过程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要旨，并在按语中指出：“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传土之说，必不可信。”强调“保群进化，与天争胜”。号召人们奋发图强，保国保种。严复的著译，打开了中国人民的眼界和思路。因此，《天演论》出版后，震动了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思想界。各书局争先刊印，传播甚广。正如鲁迅所说：“中国迨日，进化之语，几成常言，喜新者凭以丽其辞，而笃故者则病侨人于猕猴，辄阻遏以全力。”^{〔7〕}虽然有的人是为了追求时髦，用以作为谈助；有的人不相信猿猴是人类的祖先，竭力反对。然而有识之士则受到启示和鼓舞，莫不悦服。孙中山就自称“于西学则雅癖达尔文之道”^{〔8〕}，一再赞扬达尔文的学说是一大发明，使世界的思想为之一变。他常以进化论思想来激励中国人民求进步，谋发展，建立富强康乐的新中国。

满怀爱国热情的青年鲁迅读了《天演论》，深深地为这一新颖的先进思想所吸引，而爱不释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科学论证，乃宇宙的真理。这一惊人的发现，对于为中华民族谋生存，为中国人民求解放，为祖国前途寻找出路，提供了光明的前景，增长了必能实现的信念，所以深信不疑。鲁迅早期的地质学著作《中国地质略论》和《中国矿产志》即用进化论观点，阐述了地球和生物发生发展的历史。一九〇七年发表《人之历史》，详细介绍了达尔文主义的渊源和演进，认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足以“扫群疑于一说之下”；肯定达尔文“立生物进化之大原”，是“空前古者也”。这是一篇继严复译述《天演论》之后向中国传播进化论学说的重要文献。以后他所写的《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论文，所持论点，大都以进化论和个性主义为依据。毫无疑问，鲁迅这时期是自觉地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用以作为斗争的思想武器，并非一般的影响。这一思想，还累见于《热风》、《坟》、《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杂文集中，一直持续到“五四”至大革命失败前夕，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严复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介绍进化论，是想通过“生存斗争，适者生存”这一生物进化的规律，说明社会也不例外。中国若要救亡图存，自强保种，必须改变落后面貌，效法西方，走资

本主义的道路。这对于反对墨守陈规的顽固派、守旧派，促国人猛省，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是起过进步作用的。然而严复在介绍进化论时，却表现了两种倾向。他主张中国必须变革，却认为“不可以期之以骤”，幻想中国在原有的社会制度之下，经过渐变，自然而然地走向“富强”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他说：社会的进化，是“兼谋新率旧并存之”，“实兼中庸之精义”，表现了维新派的妥协性。强调新旧之间，“互谅互存”；人群之间，“除愤解器”^{〔9〕}，实际上是反对阶级斗争，走和平进化的道路。明显地表现了庸俗进化论的倾向。他又认为“‘物各竞存，最宜适者’。动物如此，政教亦如是也”。把生物进化的规律，应用于社会政教；把生存斗争，优胜劣败，视为人类进化的准则。大力宣扬优胜之道，在于“智、德、力”三者。^{〔10〕}这又明显地表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

进化论在中国广泛传播之后，由于它本身存在的错误和缺陷，导致了以上的两种反动倾向。一般信奉进化论者，或者因不能识别达尔文学说所存在的问题，盲目接受；或者因立场观点不同，取其一端，任意渲染，遂成为庸俗进化论者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应声虫。清末的康有为、梁启超力主“由专制而立宪而共和”，认为目前“只可立宪，不能革命”，就是从庸俗的进化论观点出发的。孙中山严厉地驳斥了这种观点，号召国人采取革命手段，“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11〕}。章太炎也曾察觉到进化论的流弊，他看到人类社会比生物界复杂得多，不可能什么东西都越变越好。他于是写了《俱分进化论》，指出“进化之事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除非“于进化诸事类中，亦惟择其最合者而倡行之”。什么是“最合者”而应当“倡行”的呢？只有“社会主义，其法近于平等”。章太炎把事物分成善恶两个方面，进化之道，以选择善者为宜。但怎样使善者进化，恶者淘汰呢？怎样实现人类最平等的社会主义呢？那只有靠人们的主观努力，因此斗争不可避免。从这里可以看出清末的革命派和维新派，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在运用进化论时便各持己见。

五四运动时期，是提倡民主与科学的，进化论思想几乎贯穿《新青年》前期的多数主要作者的文章中。这时除了鲁迅，仍不外庸俗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两种倾向。

前者的典型代表为胡适。胡适和另一些资产阶级右翼文人借进化论之名，宣扬詹姆斯、杜威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等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和社会学，提倡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利用达尔文学说中否定质变和抹煞人类社会与生物界的本质区别的错误的，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无论是自然的转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由于一点一滴的变异”。而共产主义者却“忘了这个原则”，妄图“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并妄图“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把持不变”^{〔12〕}。“五四”以后的中国改良主义者，鼓吹庸俗的进化论，目的在抵制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胡适的论调，充分地表露了这一点。

代表后者的是陈独秀。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说：“社会进化，因果万端，究以有敢与社会宣战之伟大个人为至要。自来进化之社会，皆有此伟大个人为之中枢，为之模范也。”^{〔13〕}又说：“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进也。”^{〔14〕}他常用“生存斗争”的公式来作为激励青年争取“优胜”、避免“劣败”的理论根据，并由此导出他的极端轻视人民群众作用的观点。此外还有人本“生存斗争”之说，在《新青年》上公开鼓吹“军国主义”。说“求生意志为世界之本源，竞存争生实进化之中心。国家者求生意志所构成，军国主义者竞存争生之极致也”^{〔15〕}。但由于中国积弱已久，并不是强有力的资本主义国家，

要想穷兵黩武，征服别族，不过是梦呓而已。所以此说附和的不多。那些迷惘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只能用“优胜劣败”，来证明有产者剥削无产者，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的。不言而喻，庸俗的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是反动的反革命的，失去了达尔文进化论本来的意旨。鲁迅后来说：“进化学说之于中国，输入是颇早的，远在严复的译述赫胥黎《天演论》。但终于也不过留下一个空泛的名词，欧洲大战时代，又大为论客所误解，到了现在，连名目也奄奄一息了。”〔16〕说明了进化论在中国流传，大都没有得其要义。庸俗进化论只给进化论留下一个空泛的名词，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又歪曲误解了进化论。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三

我们研究鲁迅前期的思想，是不能回避进化论的。但是必须与庸俗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严格区别开来。鲁迅研究过生物学，全面了解达尔文学说的实质，真正懂得进化论的精髓之所在。他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吸收了进化论合理的内核和革命的内容。对于它的流弊，则采取批判的态度。他坚信人类由猿猴演化而来的科学论断，责问那些以人类和猿猴同祖先为耻辱的顽固派、守旧派说：“人类进化之说，实未尝读灵长也，自卑而高，日进无既，斯益见人类之能，超乎群动，系统何妨，宁足耻乎。”〔17〕从猿到人，是生物进化的结果。鲁迅开始接触达尔文主义时，就相信这是确切不移的真理，从而建立了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观。他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讲《革命时代的文学》时，还举了猴子为什么能变成人的例子，来阐明革命的意义。他从达尔文的进化论，深刻地理解到“世事之常，有动无定”〔18〕。天地间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也没有已经发展到了止境的事物。任何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变化促进了事物的发展。永恒不变，停滞不前，或循环周转，回复故道是没有的。

鲁迅从这一辩证观点出发，多方面地论证了人类社会也是象生物进化一样，永远向前发展的。他打了一个比喻：“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著物不止，祈逆飞而归弦，为理势所无有。”人间的进化，就好象射出去的箭，决不会回到弦上。所以说，“日逐而不舍”，是“人间进化的一因子”；“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使拂逆其前征，势即入于零落。世界之内，实例至多，一觅古国，悉其信证”〔19〕。他认为动植物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20〕。历史的进程是没有尽头的，在进化的征途上，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任何时候，都不过是中间物，永远向前发展。但人类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人历进化之涂，其度大有差等，或留蛆虫性，或猿狙性，纵越万祀，不能大同”〔21〕。故人类总是有后进与先进之分。由于任何事物都是处在“自卑而高”，从低级到高级的轨道上，那么谋“国民发展”，就“不能盲目夸耀祖宗”〔22〕。因为“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23〕。为了人类社会的日新月异，“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24〕。旧的不破，新的不立，旧的必须为新的而牺牲。所以鲁迅反对“从来如此”。反对因循守旧，相信青年必胜于老人，将来必胜于过去。今必胜古，后必超前。这一客观规律，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

对于人类社会的进化，随时间的推移，“强之种日昌，而弱之种日耗，时代既久，宜者遂

留，而天择即行其中，使生物臻于极适”。这是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要旨。但鲁迅所强调的是“人择”，而不是“天择”。“人择出人意，而天择则以生物竞存之故，行于不知不觉之间耳。”〔25〕他之所以侧重“出人意”的“人择”，是因为人为选择，有利于积极推动社会的发展。在鲁迅看来，这比消极的等待时间演变更见成效。他一再提醒人们，“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26〕。中国社会，务必改革，“使它能适于合理的生活”，只要“许多人预备着，改革着，久而久之，自然可望实现了”〔27〕。为了争取进步，他号召人们积极从事活动，努力向上，反对苟活，反对安于现状，所以他说：“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28〕路是人走出来的，社会是人改造的，必须尽人力来促进人类的进化，社会的发展，而不是坐待演变，听其自然。

其次，鲁迅对于事物的变化发展，是重视内因的。他说：“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能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29〕又说：“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30〕所谓“内的努力”，就是事物本身不断克服内在的矛盾，才能达到进化的目的。没有这种努力，进化就不可能。新思想的传播，革命的勃起，也是这样。假如人们没有相应的内在条件、要求和觉悟，完全靠外来的影响，是不会发生作用的。鲁迅前期虽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精通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的唯物辩证法，可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向事物外部去寻找变化发展的原因，而是肯定事物变化发展主要是出于“内的努力”，这当然是正确的。

再其次，鲁迅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还在于顽强的斗争、反抗、破坏、甚至流血，迫使旧的灭亡，促使新的诞生，来争取人群的生存、温饱和发展。他坚决表示：“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鬼……全部踏倒他。”〔31〕“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32〕阻碍中国进化的是谁呢？无疑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就有必要为粉碎一切封建枷锁，解除一切封建束缚，摆脱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压迫而英勇抗争。他严厉地批判了严禁反抗斗争的中国统治者和贪图安逸的人们，指出：“不争之民，其遭遇战事，常较好争之民多。而畏死之民，其零落殒亡，亦视强顽敢死之民众。”惟有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国民，才能创造美好的前途。他极力推崇那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欧洲民主爱国诗人。称赞他们“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之人，绵延至于无已。”〔33〕鲁迅对这些民主爱国诗人的评价，抒发了当时一般批评家所不能企及的精辟见解，他所颂美的“争天拒俗”的反抗精神和战斗精神，正是鲁迅的进化论思想最富有生命力的表现。

经过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鲁迅深深懂得了“人道是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捐助的。”〔34〕旧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处在被吃地位的人民要谋求解放，只有靠自己斗争，决不能寄希望于别人的恩赐。为反动势力统治了几千年的“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35〕。因此，要有“革新的破坏者”、“凶猛的闯将”。对一切黑暗腐朽反动的东西，必须竭力加以排击，丝毫没有妥协的余地。对敌人，要“打落水狗”，要“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

人之身”，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要“血债必须用血来偿还”。反对“宽恕”，反对“容忍”，反对“勿以恶抗恶”。这样才能换来“人道”，人们才能得到生存、温饱和发展，人类社会也才得以真正向前发展。

鲁迅还清醒地认识到：“人类既出而后，无时无物，不禀杀机。”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矛盾冲突的结果，必然引起战争，永久和平是没有的，“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其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争方已或未始之时，外状若宁，暗流仍伏，时劫一会，动作始矣。……故杀机之昉与有生偕，平和之名，等于无有。”〔36〕在阶级社会里，有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有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所以战争不可避免。要使“战争绝迹，平和永存”，“须迟之人类灭尽，大地崩离以后”〔37〕。但正义的战争，足以促进文明，引起社会的质变和历史的飞跃。盲目地反对战争是非现实的，也是非革命的。消灭反动派，抗拒侵略者，都得流血。“无流血于众之目前者，其群祸矣；虽有众之不视，或者进而杀之，斯其为群，乃愈益祸而不可救也！”〔38〕这与当时主张流血来实现共和，借以达到革命目的的孙中山的见解是相接近的。后来鲁迅经过五卅运动，“八·一三”惨案和北伐战争，体验更深。他接连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39〕中国“总要改革才好。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40〕“中国现在的社会情况，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41〕只有用革命的暴力来反对反革命的暴力，革命才能成功。

强调人为选择，强调内因起决定作用，强调用反抗、战斗、破坏、以及战争来解决中国社会光明与黑暗，新生与腐朽，进步与反动之间的矛盾，借以最快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与标榜和平进化的庸俗进化论者，简直有天壤之别。

此外，鲁迅认为进化是为了使广大人民从封建压迫、封建奴役中解放出来，也是为了使弱小民族从异族压迫、异族奴役中解放出来。所以进化的另一要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白人的种族歧视，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使天下人人归于一体，社会之内，荡无高卑”〔42〕。这一思想，鲁迅在接受进化论的初期，就充分地表露出来了。他斥责那些“嗜杀戮攻夺，思廓其国威于天下者”，为“兽性之爱国”。“盖兽性爱国之士，必生于强大之邦，势力盛强，威足以凌天下，则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弱小而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不嫌也。”帝国主义持生存斗争，优胜劣败之说，其野心在于征服全世界，“人欲超禽虫，则不当慕其思”。他正告“佳兵之士”，“自屈于强暴久，因渐成奴子之性，忘本来而崇侵略者最下”。复告“华土壮者”：“勇健有力，果毅不怯斗，固人生宜有事，特此则以自臧，而非用以搏噬无辜之国。使其自树既固，有余勇焉，则当如波兰武士贝谟之辅匈加利，英吉利诗人裴伦之助希腊。”“凡有危邦，咸与扶掖，先起友国，次及其他，令人世间，自繇具足。”〔43〕聪明的军事家不可自屈于强暴，因而崇尚侵略。中国青年固应勇健果毅，不怕牺牲，这是为了自卫，而不是为了侵略别人。如果有余力，则当援助那些受侵略的国家。因此，鲁迅极力赞赏拜伦为希腊的独立而英勇献身，“不克厥敌，战则不止”的英雄行为。赞美他“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的爱憎精神；赞美他“自尊而怜人之为奴，制人而援人之独立，无惧于狂涛而大傲于乘马，好战崇力，遇敌无所宽假，而于累囚之苦，有同情焉”〔44〕。在这里鲁迅很清楚地表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侵略者“无所宽假”，对受奴役的人民，则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西方帝国主义本着民族的优越感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不但穷凶极恶地侵略压迫其他民族，而且惨无人道地虐待本国有色人种。鲁迅读了描写黑人生活的小说《黑奴吁天录》后写道：“白人虽号文明，然其待异族，实无人道之可言。保存种族，惟在自强。”这是鲁迅一方面受了赫胥黎《天演论》的启迪，另一方面则在日本亲身经历了帝国主义的民族歧视政策，深有所感而作出的民族斗争的经验总结。

就阶级来说，鲁迅是站在被奴役者一边的；就国家来说，鲁迅是站在被侵略者一边的；就民族来说，鲁迅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的。他与社会达尔文主义采取了完全对立的立场。

由此可见，鲁迅的进化论思想，除了最主要的科学发展观之外，还包含有一些精粹的辩证观点，有如上述。加之鲁迅早年就对中外历史作过深入的研究，深刻理解到：“人间教育诸科，每不即于中道，甲张则乙弛，乙盛则甲衰，迭代往来，无有纪极”。世界是在矛盾斗争中前进的，不可能不偏不倚，甲发展则乙废弛，乙兴盛则甲衰退，交相替代，没有终了。他又理解到“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45〕。事物的发展，不可能直线前进，而是象螺旋形那样曲折地上升。有如流水，波涛起伏，时进时退，久而久之，便归入汪洋大海。诸如此类的见解，实际上超出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到了与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颇相接近的地步。因此鲁迅与陈独秀、胡适大异其趣。陈独秀曾借进化论宣扬“优胜劣败”的错误观点，后来竟成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胡适则是借进化论公然排斥马克思主义，抵制工农革命运动。鲁迅则不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鲁迅受到深刻的影响，从此产生了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的思想因素。当他还没有放弃进化论、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时候，他不但从未反对、排斥过马克思主义，指责、嘲讽过共产党，而且是认真对待马克思主义，逐渐靠拢共产党。他一直是歌颂十月革命的，一直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采取一致的步调。这当然是首先由于他的坚定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所决定的，同时也与他在世界观上已经具有或开始形成某些辩证观点有关。这样便有可能使他思想中的新的因素，经过不断的斗争实践和事实的教训，不断的学习马列主义和严格的自我解剖，终于克服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46〕，由客体变成主体，一跃而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了。正因为如此，鲁迅才无愧为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中国“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的进化论思想，固然阻碍了他较早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它所包含的实际上超出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某些辩证观点，又有助于他最后放弃进化论，改而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四

鲁迅前期的思想，除进化论外，个性主义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所谓个性主义，就是坚持个人的独特的思想性格的特点，而不苟同于他人；坚持人格独立，而不为他人所奴役。它的思想基础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先驱者所鼓吹的人性、人权和个性自由，都是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一些国家，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涨和发展，工商业的发达，享有“物质文明”的盛誉，实行宪法，由国会掌握政权，被视为各国应当效法的良好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为了解除宗教束缚和反对封建统治，还提出

了以个人为本位的天赋人权、个性解放等口号，这一思潮曾风靡一时。

鲁迅于一九〇七年在日本所写的《文化偏至论》，可说是提倡个性主义的一篇宣言书。同年所写的《摩罗诗力说》和次年所写的《破恶声论》，继续发挥了这一思想。鲁迅提倡个性主义，是与他的进化论所强调的人为选择密切相关的，目的在促成中华民族、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的进化。他针对当时西方的“物质文明”和议会政治的恶果，以及中国清朝政府的洋务派和改良派或意欲追求西方的“物质文明”，或意欲仿效西方的议会政治所产生的流弊，认为“物质也”，“众数也”，“其道偏至”。〔47〕于是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简言之，即“非物质”、“重个人”。这便是鲁迅的个性主义的主要内容。这两句话，并不完全是鲁迅从外国人的学说中照抄来的，也不完全是鲁迅本人的发明，而是鲁迅在当时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潮影响下，结合他所感觉到的中国现实所作出的论断。

中国自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战争一败涂地之后，列强虎视鹰瞵，豆剖瓜分的危机，迫在眉睫。以封建官僚为主体的洋务派以为中国的失败，只是因为武器不如人，遂“竞言武事”。既不知中国的国情，又不察欧美的实际，片面强调“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为了坚甲利兵，扩充武备，盲目地信赖外国人的“物质文明”。他们不懂得不如“启人智而开发其性灵，使知罢获戈矛，不过以御豺虎”，单靠武器是不能抗拒外侮的。假如“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洋务派的唯武器论，并非“根本之图”。另一种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他们侈谈“制造商估立宪国会”，美其名为振兴工商业，实则“假力图富强之名，博志士之誉”，使自己升官发财，“广有金资，大能温饱”，即使宗社为墟，他们却“善自退藏”，可以幸免于祸，仍然可以过席丰履厚的生活，这些都是财迷心窍的人们。说是推行立宪的国会政治，只不过是骗老百姓的。那些国会的议员们，并不是真正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表面上“皈依于众志”，实则遂其私欲，排除异己。“见异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这样的政府，“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再不就是“善垄断之市侩”。政权落到“千万无赖之尤”的手里，“民不堪命矣”。古者“以独制众”，人民还要造反；今者以“以众虐独”〔48〕，竟不许人民反抗，民主自由，成了空话，这当然也不是“根本之图”。

洋务派“竞言武事”，以机械为先，见物不见人。改良派力主“制造商估立宪国会”，蔽于物欲，使出类拔萃之士，“混于人群”，“人丧其我”，“灭裂个性”。〔49〕这种偏向，是由于单纯地追求西方的洋枪大炮、工商企业和国会政治必然的结果。当时鲁迅认为中国本来是“尚物质而疾天才”的，可是今已丧失了固有精神，一遇外寇，不能自存。而“轻才小慧”如洋务派和改良派，只知“抱枝拾叶”，“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中国之所以衰微，既有内在的原因，那就是“本体自发”的“偏枯”；也有外在的原因，那就是从外国“传来”的“新疫”，“二患交伐”，加速了中国的“沉沦”。鲁迅清醒地察觉到欧美的物质文明，不过是金钱万能，唯利是图，势必使社会人群物欲横流，不可遏止。资产阶级的国会政治，不过是多数压制少数，其压制的厉害，更有甚于暴君压制群众。束缚个性，桎梏精神，有才能的独立特行之士不得脱颖而出。危害国家与人民，不言可知。鲁迅因而提出“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意在纠正这种偏向，务期国人觉悟起来，不为物欲所蔽，不为奴性所桎梏，解放个性，发扬主观精神，使人尽其才，由此而走上自强自救的道路。

这对清朝末年说来，是不无现实意义的。

鲁迅的个性主义，其中心思想是以人为第一因素。一个国家的盛衰，民族的强弱，“根柢在人”，因为人是万物的主宰，也是社会的主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故中国处于世界，与列强角逐，“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鲁迅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没有强有力的人，什么事也做不好，什么武器，也不过是一堆废铁。但要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就得有不平凡的自觉，保持个性的尊严，“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今日所贵和所望的，“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这种人，“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悞也”。^[50]所以“立人”的“道术”，必须“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所强调的个性，即是“人各有志，不随风波”，“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假如不独立特行，不坚持主见，不执着自我，不张大个人的人格，随波逐流，附和众说，那就不可能发挥转变风气，改革社会的作用。鲁迅视“精神现象实为人类生活的极颠”，这是与他尊个性分不开的。他所赞美的“灵明”、“内曜”、“心声”、“主观”、“意力”等，无不属于精神现象。它标示一个人的个性，也支配一个人的个性，说它是人类生活的顶点，就是因为精神是人们内心世界的集中表现。怎样的人，就有怎样的精神面貌，精神丧失，便无所作为了。“故精神界之战士贵矣”^[51]。那时鲁迅从这方面来考察广大群众，觉得大多数都是愚昧无知，庸碌无能，“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佗俗横行，浩不可御”，这样的大多数怎么能够担当起复兴民族、挽救国家的大任呢？因此只有寄希望于少数的英哲、天才，乃至超人。“夫一导众从，智愚之别即在斯，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当时鲁迅认为，在民智未开的社会里，是不能依靠“大众”的，惟有属望于一二明智之士，使他们“立之为极，俾众瞻观，则人亦庶乎免沦没”^[52]。这就是他所说的“惟超人出世乃太平”的意思。即把具有良知良能的先进人物，作为领袖和楷模，让大家向他学习，从而改变思想面貌，发扬国民精神，导群众于改革的正途。

鲁迅个性主义的矛头是指向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以矫十九世纪文明而起者耳”。对抗世俗，反对凡庸，要义在此。他“崇奉主观，张皇意力”，旨在“匡正流俗”。他的非物质主义，“犹个人主义然，亦兴起抗俗”。后来他解释“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53]。实际上也还是对抗世俗，反对凡庸，期在导愚起弱，解放个性，使人民的思想获得自由。这对于打破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枷锁，揭露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真相，是有着启蒙意义和战斗意义的。但是它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产物，误解了物质和精神，群众和个人的关系，把物质和精神，群众和个人对立起来，抹煞物质，漠视群众，把个人和精神绝对化，过分强调个人和精神的作用，这就由否定一种偏向而又走向另一种偏向了。

五

关于鲁迅的个性主义的形成，有其内因，也有其外因。内因是由于中国经过长期的封建统治，大多数群众被“治”得愚昧无知，麻木不仁了。确实需要一个激烈的个性、思想、精神解放运动，来唤起人民的觉醒。外因除了受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想影响外，还受到当时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的某些影响。如施蒂纳、叔本华、契开迦尔、尼采等。特别是尼采，鲁迅称他为“个

人主义之至雄桀者”，鲁迅的好些文章和书信都提到过他。《摩罗诗力说》一开头就引用了“古泉尽”“将求新源”的尼采《苏鲁支语录》。《狂人日记》中的从虫子一直变到人的那段话，也是从《苏鲁支语录》来的。《随感录四十一》引用了《苏鲁支语录序言》中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的全文。鲁迅还翻译了《苏鲁支语录序言》，题为《蔡拉图斯忒拉的绪言》，发表在《新潮》月刊。在中国较早介绍叔本华和尼采的是王国维，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里说：“鲁迅也喜欢尼采”，并非虚言。曾经与鲁迅交往过的一些朋友，也有同样的看法，如刘半农送给鲁迅的联语：“托尼（即托尔斯特和尼采）思想，魏晋文章”。当时都认为恰当，鲁迅也不加反对。^{〔54〕}一九二七年初鲁迅从厦门去广州，林语堂作《译尼采〈走过去〉送鲁迅离厦门大学》，简直把鲁迅当着是中国的尼采了。瞿秋白认为“鲁迅当时的思想基础，是尼采的‘重个人非物质’的学说”，“倾向尼采主义”。^{〔55〕}曹聚仁则“以为鲁迅的观察深刻，与眼光远大，并不由于接受了唯物史观的论据，而由于他的科学头脑以及尼采超人哲学的思想”。^{〔56〕}连苏联的谢曼诺夫也说尼采给鲁迅的影响“并不完全是消极的”。这些议论，有的未免言过其实，鲁迅那里会象“不抗恶”的托尔斯特呢？尼采的超人哲学，怎么会使鲁迅观察深刻，眼光远大呢？鲁迅绝对不能与尼采划上等号。但是尼采的学说对早期鲁迅思想的影响，从他的个性主义的涵义看来，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过这种影响是局部的，不是全面的，是一个时期内的，不是长时期的。而且鲁迅接受了这种影响，在理论实践方面与尼采的意图有所不同。

尼采（1844—1900）是德国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是法西斯思想的前驱。他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中期和后期，这时欧洲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在欧洲最发达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57〕}。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敲响了资产阶级的丧钟。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夺取政权的初步尝试，引起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无比恐惧和敌视。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加趋向反动，资本主义也就逐渐进入了自己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尼采的哲学活动，刚好处在这个时期。当巴黎公社的武装起义遭到失败，他打着以复兴艺术的浪漫主义和英勇精神而斗争的旗帜，鼓吹“重新估计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否定日益没落的资产阶级文明，推翻一切旧有的社会秩序，要建立一个强者君临天下的新世界。

尼采用达尔文进化论的生存斗争学说解释社会现象，将叔本华的具有悲观色彩“唯意志论”发展为“权力意志”说。宣称人的价值是由天生在人身上的权力意志的质和量决定的，谁天赋的权力意志越大，谁的统治本能就表现得越明显，谁的生物价值乃至他的社会价值就越高，于是便得出了强者蹂躏弱者，老爷凌虐奴隶是理所当然的结论。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是生命的最高目的，是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唯有权力意志，才能使弱者自然受强者的统治，奴隶自然受老爷的压迫。他把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看成是分成不同等级的力量，这些力量彼此在较量权力意志，并根据这种神秘意志的质和量而分出高低。强者永远靠牺牲弱者而生存，任何力量组合中的权力意志不外是强欺弱，胜利永远是强者。“要是你软弱到不能给自己立法，那末就应该由暴君将牛鞭加在你的身上，并告诉你：‘你得服从！尽管你咬牙切齿，你得服从！’”“一切善和恶就淹没在对暴君的服从之中。”“让弱者受苦难吧！”他这样的告诫人们。他认为人类没有文化是不可思议的，文化没有奴隶制度是不可能的，为了挽救文化免于退化，挽救人类免于灭亡，非复活奴隶制度不可。维护这种等级制度，是生命本身的最高规律。

社会集团之间，就是老爷与奴隶之间的对敌状态，人只对与自己平等的人承担义务，对低级以及一切非我属类的人，完全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在他眼中，群众都是“莠民”、“败类”、“贱氓”、“愚民”、“畜群”、“市蝇”。他说：“假如你想呼吸新鲜空气，就不能到平民的地方去。”“生命是快乐之井，但是只要愚民也在这里喝水，井水就被污了。”“人之初性本恶，”人如同野兽，对待他们只有用野蛮的手段。因此，他们应该安于奴隶的悲惨遭遇，乖乖地接受命运和老爷皮鞭的打击。“富人对穷人永远没有错。”尼采给得势的新的垄断资产阶级、金融贵族创造道德价值，给没有良心的“超人”肯定其自私自利的阶级独断，美化寄生的垂死的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这个阶级为了保持其统治地位，不惜煽起人身上一切卑鄙野蛮的本能，来进攻自己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这就是尼采所鼓吹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从权力意志和等级制度的观念出发，尼采确立了他的“超人”学说。所谓超人，按尼采的解释，就是最高的生存形式，是人在生物进化中的最高极限，是以广大群众为底层的社会金字塔的顶点。古代的超人是奴隶主中的精华，是奴隶主贵族中最高、最显赫、性格最勇敢坚决的代表人物；现代的超人是先前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统治者精华当然的合法的继承人。超人是权力意志的最高集中，是统治阶级集体的权力意志最理想的化身。超人有至高的威力，无比的智能，因而有无可争辩的发号施令、支配一切的权力，国家本身就是超人的工具。他宣告超人即将降临，超人的创造将带来神话般的幸福，而这创造的第一举动，就是必须战胜古今的统治者，战胜鼓吹人人平等和社会正义的小人物。生物的发展由虫豸而猿猴，由猿猴而人，而超人。人既然可以杀害禽兽，超人自然可以凌辱一般的人。人应该为超人准备土壤、植物和动物，为超人情愿自己死亡。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一丘之貉，都必须反对。尼采还崇拜种族主义和侵略战争，认为人的生物本能就是“侵略和防御的利己主义”，战争是生命的自我上升和自我肯定的首要条件，战争是培育高等种族的最好方法。他赞同马尔萨斯为祛除剩余人口所开的药方，以战争来集体屠杀，它能把种族里的“病鬼”和“弱者”清洗干净。没有战争，人类社会变得善良、枯竭、渺小、衰老，就会在道德上死亡。尼采还竭力宣传男女不平等，他骂女人是低级动物，说是“你要走向妇人们去么？别忘记了你的鞭子”！总之，尼采的上帝就是资本，尼采哲学的基本倾向，是反民主主义、反社会主义、反理性、反科学、反道德、反人道主义的，是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服务的。它是在十九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期，资产阶级的政治发展到抛弃资产阶级民主形式而采取公开的暴力专制政治的思想反映。

假如我们拿鲁迅前期著作中所阐述的个性主义观点，与尼采的学说相对照，就不难发现其中确有某些类似或相近之处。如尼采要“重新估价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否定过去的一切，再建社会秩序，鲁迅也采取重新估价一切的态度，既摒弃东方的“精神文明”，也摒弃西方的“物质文明”，认为“什么都要从新做过”。〔58〕尼采抨击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谓“民主国家是超人之敌”；鲁迅对“政治之权，主以百姓”，也曾表示怀疑，认为“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邇”。〔59〕尼采宣称超人的降临，将给人类带来幸福；鲁迅则说：“惟超人出，世乃太平”。尼采鼓吹权力意志，说“真理永远是主观的”；鲁迅也主张“崇奉主观，张皇意力”，谓“主观与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有方舟者焉”。〔60〕尼采视群众为“愚民”、“贱氓”，鲁迅也一度视群众为“伧俗”、“庸众”。这些都说明了

鲁迅前期的个性主义与尼采有一定的关联。当时鲁迅不仅仅介绍了尼采的学说，而且曾经受过他的影响。

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为什么会受到这样一个反动哲学家的思想影响呢？这是我们要辨别清楚的。梅林说尼采哲学客观上是“大资本的赞诗，因而也就拥有广大的读者”。〔61〕而“资本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2〕赞美大资本，却拥有广大的读者，似乎难以理解，实则有其时代的原因。尼采哲学产生于帝国主义上升时期，从思想上和理论上重新武装了进入没落和腐朽阶段的资产阶级，它那一矫旧说的狂热，鄙视愚弱的高傲，凌厉无前的韧性，横扫一切的勇气，以及激烈而带有煽动性的言词，对于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真理而正在寻找革命出路的小资产阶级青年来说，是有蛊惑力的。当尼采哲学问世之初，就有人赞美它是真正的生命哲学，也是深深具有生存主义性质的哲学。认为尼采是人类精神最深入的探索者之一，认为他的人格，使我们的血液鲜美，使我们的感情和观念形成，使我们生活在饱满的气氛中。连卢那察尔斯基一方面对尼采的“恶毒而顽固的贵族主义”批判得非常尖锐；另一方面对尼采的“热爱生命旺盛”却表示欢迎，对他“与基督教、小市民道德”的斗争更深为钦佩。〔63〕我国的郭沫若不是在他的名诗《匪徒颂》里将尼采与哥白尼、达尔文并提，说他们都是“学说革命”者，而为之三呼“万岁”么？郭沫若与茅盾都翻译过尼采的主要著作《苏鲁支语录》，茅盾还写过专文介绍尼采的学说。〔64〕尼采哲学一时震动欧洲，很快传播世界，不是偶然的。鲁迅提倡个性主义，受到尼采的影响，也正是由于时代的原因。因为“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65〕。鲁迅接触尼采学说，无疑是有这样的感应的。他着眼的是尼采与卢梭、施蒂纳、托尔斯太、易卜生等，乃是“轨道破坏者”，“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而“中国很少这类人，即使有了，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66〕。又说：“不论中外，诚然都有偶像。但外国是破坏偶像的多；那影响所及，便成功了宗教改革，法国革命。旧象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那达尔文，易卜生、托尔斯太、尼采诸人，便都是近来偶像破坏的大人物。”〔67〕鲁迅因为尼采是旧轨道偶像的破坏者，才推崇他，并接受他的影响的。对于他的学说的反动性并未加以深究。

说鲁迅受过尼采的影响，并不能说鲁迅前期的思想与尼采一脉相通。相反的他们由于立场不同，出发点不同，所追求的目标不同，彼此的思想本质有原则的区别。尼采是迷信暴力的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所要破坏的轨道主要是正在走下坡路的资产阶级民主和正在兴起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轨道，所要破坏的偶像主要是国家、法律、道德和基督教的上帝。鲁迅是革命的民主主义战士，所要破坏的轨道主要是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轨道，所要破坏的偶像主要是旧制度、旧传统、旧文化、旧思想的说教者。尼采鼓吹权力意志，超人哲学，无限地扩张自我，推翻了一个上帝代之以另一个上帝，肆意蹂躏下层人民，以强凌弱，以寡暴众，公然为剥削制度和利己主义辩护。鲁迅的超人是指人类具有卓越才能和真知灼见的贤哲，是人类前进的火炬，人人敬仰的榜样，是以先觉觉后觉，先知启后知为己任的。他曾指出：“尼采式的超人”“太觉渺茫”〔68〕。他“崇奉主观，张皇意力”，意在鼓励人们树立坚强的意志，发扬不为他人所左右的主观的精神力量。因此他“重个人”，是为了广大群众的觉醒，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独断专横，是为了争取“人国”的实现，而不是有损人的尊严。鲁迅比较尼采和拜伦。